

中原成为中国古代发展中心的原因

裴安平

(网址: www.peianping.com)

从夏代开始,中原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段发展中心。但史前不是,元明清及以后也不是。

一、史前不是“中心”的原因

由于北方民族的崛起从而推动中国元明清政治中心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这里主要讨论史前中原也不是“中心”的主要原因。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史前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玫瑰花瓣形结构”¹,因为中原具有地理位置的中心性、考古学文化优势的发展状态与吸引力。

然而,类似的现象并不存在。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的中心地区都属于地缘性质的中心。有二种类型。第一种,可称为“发展中心”,出现的时间较早,史前也多见,主要特点是有关生产与生活方面发展状态比较先进;第二种,可称为“政治中心”,出现的时代较晚,最早见于距今5千年以后,主要特点是具有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统一领导与管理的能力和权力。

就“发展中心”而言,史前中原确有其突出之处,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不仅纹饰精美数量多,而且还影响广泛;此外,夯土城墙,中原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夯筑城的数量也较多,质量也最好,墙也最高²。然而,这种“发展中心”有二个重要特点。第一,各地都有自己的强项,如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器制作等;第二,这种中心对外只有非暴力的影响力,而不可能在没有暴力的支持下将这种影响力转变成区域性统一领导和管理的权利。就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虽然见于大半个中国,但它对各个地区却完全没有领导和管理权;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也一样,也见于大半个中国,可它也没有领导和管理其他地区的权力。因此,“发展中心”在时间上地域上都是多元的,也不可能利用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与发展状态的先进性自然转化或造就出一个“多元一体”的“玫瑰花瓣形结构”。

就“政治中心”而言,由于史前是血缘社会,遍地都是关系独立平等的血缘组织;因此,史前晚期以前根本就不需要,也不见“政治中心”。史前晚期,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与扩大化。于是,在实力或暴力的基础上,在人类社会组织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政治中心”。

距今5千年以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级的政治组织——一体化聚落群团诞生了,随之核心聚落群也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中心,如湖北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京山屈家岭环壕遗址(图1,1)、天门石家河城址(图1,2)。这种组织虽然还具有同血缘的性质,但它的核心已历史性的第一次具有了跨部落统一领导与管理的实力和权利。

距今4.5千年以后,随着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早期国家,以及在不同血缘与地域的聚落组织之间建立了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古国的出现,有关政治中心的等级与档次又升级了。

距今4千年以后,随着夏朝夏国的出现,第三代政治中心也出现了。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国家的组织主体与单位不再是各种血缘组织,而是同一地域范围内众多不同的血缘组织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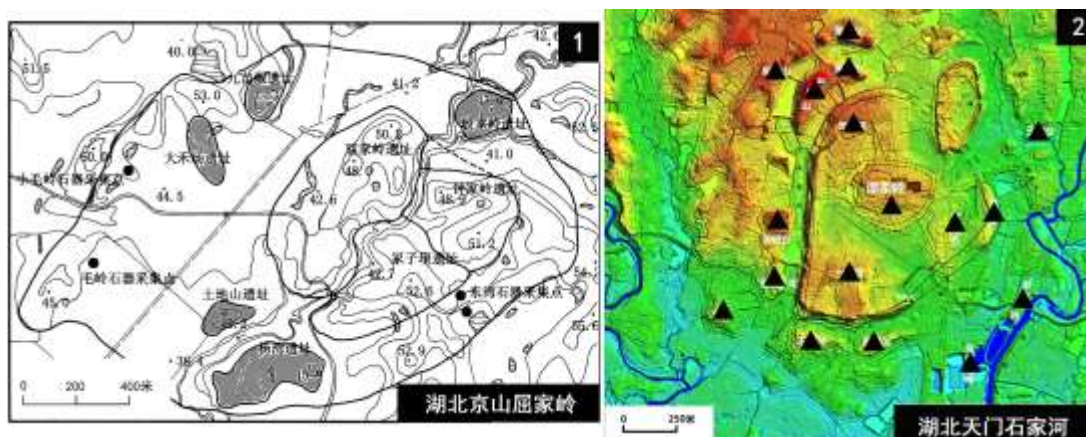


图 1：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聚落群聚平面图

（1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2 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

一构成的民族；二是地域广大实力强悍，既可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还可以下江南远“征三苗”（《墨子·非攻（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政治中心”的相继出现还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史前生产生活方面的某种发展中心完全与政治中心的出现无缘，各有不同的出现原因，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二，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大型化一体化，有关政治中心的发展也有一个不断升级的历史过程，至少在夏时期“天下（还）有不顺者”，还有“三苗”，还没有在中国全境范围内形成具有“玫瑰花瓣形结构”的政治中心。

第三，政治中心的出现与等级的升级都是暴力的推动与结果。没有暴力，没有暴力规模的不断升级，那些小型的血缘组织就没有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必要，也没有政治中心出现的社会基础。此外，也没有人类社会组织从血缘升级到地缘的必要，也没有政治中心不断升级并从血缘到地缘的社会基础。

显然，那种以为史前就存在“中原中心”的现象完全与历史的发展和规律不符。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前晚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总体上一点也不先进，既没有独一无二的“发展中心”的迹象，也没有已成为“政治中心”的实力与权力。

距今 6500 年，当湖南澧县城头山人为垒筑田埂且面积较大的稻田³代表中国最早出现了分田到户劳动者独立耕作的生产方式的时候，陕西临潼姜寨向心结构的聚落⁴却标志那里还在流行集体劳动集体消费的生产方式。

距今 6000 年，当湖南澧县城头山诞生中国史前最早第一座城址的时候⁵，中原至少晚了 500 年才见到第一座⁶。

距今 5000—4500 年，当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崛起 15 座又多又大城址的时候⁷，中原却只有郑州西山一座中国史前规模最小的城址⁸。

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仅由南向北攻占了河南半壁江山，还长期移民定居；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趁势由东向西，一直攻入了洛阳地区⁹。中原几乎全境沦陷（图 2）。

距今 4500—4000 年，当山西襄汾陶寺出现中原最大城址的时候，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与陕西神木石峁的古城规模却远远超过了陶寺。当陶寺的贵族还在无序地使用高档奢侈品随葬的时候，长江中下地区的奢侈品已经升级成为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礼器”，而且工艺与制作水平也遥遥领先全国各地（图 3）。

显然，距今 6500—4000 年，中原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同时表明，中原地区不可能是中国史前发展的中心地区，更不可能还存在一个以发展状态较落后的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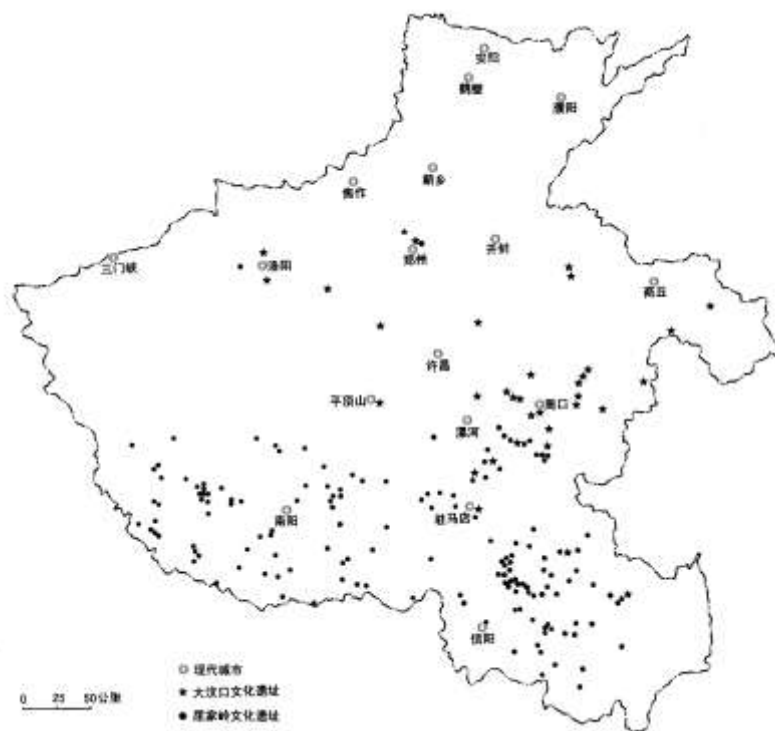


图 2：河南境内屈家岭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图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图 3：湖北天门石家河、浙江余杭莫角山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器物比较图

二、夏时期中原开始成为“中心”的原因

考古表明，虽然史前晚期中原地区的发展状况一点都不先进，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以后的“政治中心”。

夏时期中原之所以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地区，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而在于那里已开始成为中国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之所以会成为政治

中心，又因为那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与民族国家。

一般而言，民族有自然民族、实体民族二种类型。

自然民族是人的自然属性。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然环境促成的结果，以致不同地区的人在外形、肤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共性或区别。另一方面，就是地域邻近，长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都不自觉地在同一使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不过，在史前，人的自然属性与有关文化的同一性并没有任何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因为人们只认血缘不认其他。因此，史前的自然民族虽然客观存在，但独立分散，形同虚设。

实体民族就是在自然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并具有集中统一领导特征的民族。元代蒙古族、清朝女真族的历史就是自然民族转变为实体民族的代表。铁木真之所以尊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就说明在他之前的蒙古族基本上就是一种自然民族，铁木真统一蒙古族各部落之后就转变成了实体民族。清朝女真族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努尔哈赤之前的女真族就是各血缘组织独立分散各自为政的自然民族，而努尔哈赤通过战争统一女真族之后则转变为实体民族。

文献与考古共同表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就是夏民族，第一个以实体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就是夏。

文献与考古还共同表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民族、考古学文化、国家三位一体现象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实体民族建立的国家证据。

与史前晚期的古国不同，夏民族的国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国家主体的地域范围历史性的第一次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与重合，从而突破了史前晚期小型血缘组织构建的古国地域狭窄且明显小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一般规律。

正因此，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就是夏鼐先生曾说过的夏时期夏民族人民使用的文化，夏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就是夏民族与夏国的主体范围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历史与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导致单一实体民族国家的出现？

考古表明，史前晚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与冲突规模的不断升级，人类的社会组织一方面不断地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不断由血缘走向地缘（表 1）。类似夏一样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社会冲突与组织规模都扩大升级了的反映与标志。

表 1： 先秦以前中国一体化社会组织演变示意图

组织类型	时代		社会性质	组织性质	距今 7.5-6 千年	距今 6-5 千年	距今 5-4.5 千年	距今 4.5-4 千年	夏商周	春秋战国
A 型聚落群（部落）	血缘社会	血缘组织			●					
B 型聚落群（部落）						●				
聚落群团（部落联盟）							●			
聚落集团								●		
早期国家	地缘社会	血缘组织						●		
古国								●		
早期方国		单一民族							●	
晚期方国		多民族								●

（有关论述请见：《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 2014 年版；《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局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距今 7.5—6 千年，以浙江嵊州小黄山¹¹、河南新郑唐户（图 4，1）¹²等出现了核心与从属关系的多聚落遗址为代表，就是中国最早 A 型一体化聚落群即部落诞生的标志。

距今 6—5 千年，以湖南澧县城头山中国时代最早的城址的崛起为标志，说明聚落群的实力与组织模式又升级了，出现了 B 型一体化部落与聚落群（图 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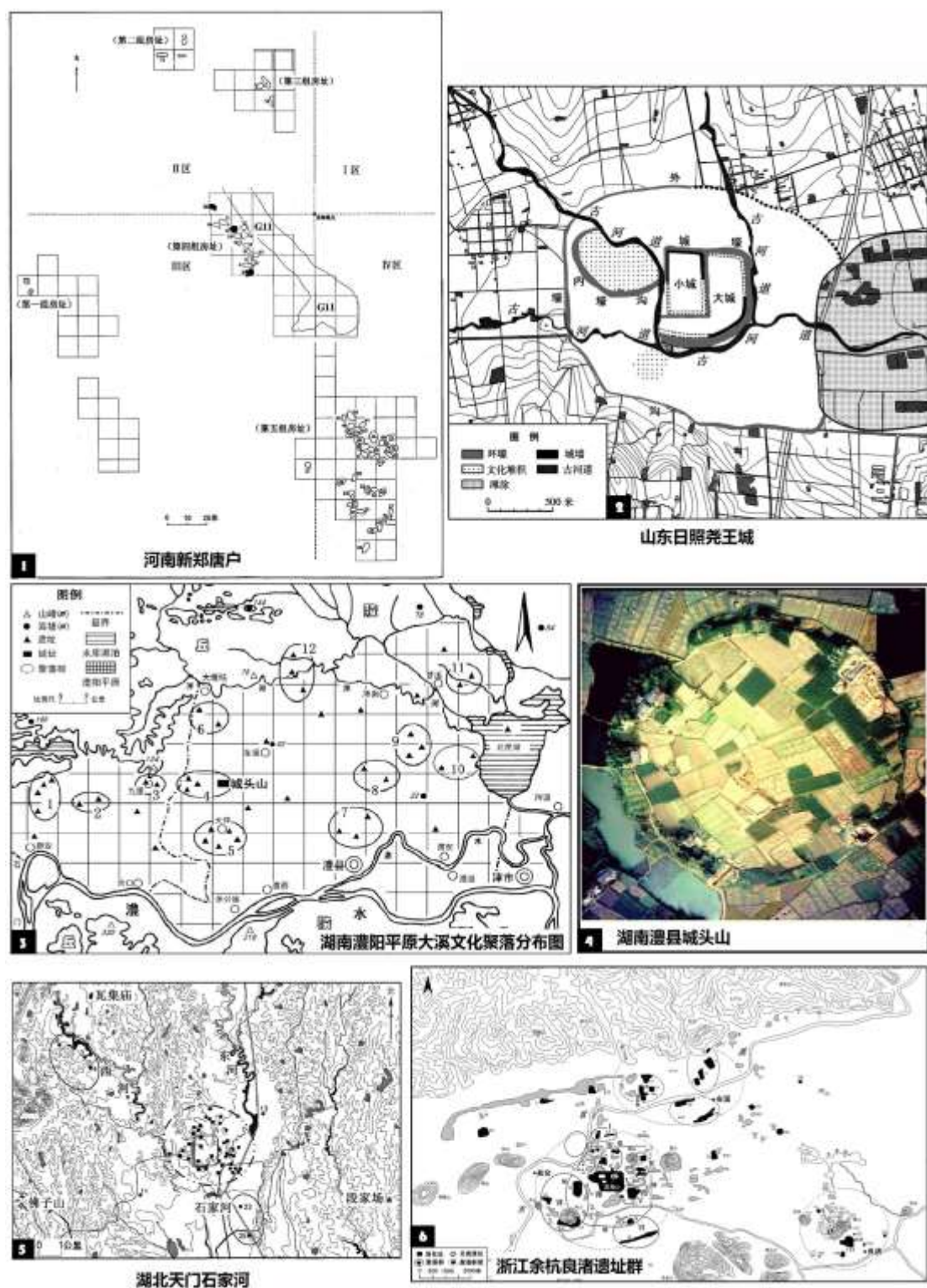


图 4：史前不同时期聚落群聚形态代表性遗址与地点平面图

距今 5—4.5 千年，以山东日照尧王城 400 万平方米的多聚落城址¹³为代表，说明史前社会血缘组织一体化的规模又升级了，出现了由多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或聚落群一体化构成的聚落群团与部落联盟（图 4，2）。

距今 4.5—4 千年，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前提下，聚落组织一方面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就是出现了空前的从血缘走向地缘的合纵连横，并分别导致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新兴聚落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在 5—6 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了 40 个聚落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传统血缘组织大型化并出现聚落集团的标志（图 3、5）¹⁴；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

三个地位和血缘不同的聚落群团构建的跨血缘联盟就是早期国家的代表（图 3，6）¹⁵；河南洛阳盆地洛河以南三个聚落组织就是又跨血缘又跨地域联盟组建早期国家的代表，而洛河北岸聚落组织的衰落则是当地出现了古国的象征（图 4，2）。

距今 4 千年以后，以洛阳盆地古国为核心，周边各独立分散的血缘组织就像铁木真、努尔哈赤统一蒙古族、女真族一样全部都被整体化一体化了。

正因此，夏民族与夏国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单位与组织规模，从小型的血缘组织扩大到大型的地缘民族，从地域狭隘的古国扩展到地域辽阔的方国；而且还表明这一切无一不是以往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的继续与结果，也是人类社会组织一体化规模不断扩大，不断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标志。

三、夏民族崛起的原因

令人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在史前一直引领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新潮的长江中游地区？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地区又为什么会诞生在以洛阳为核心的豫西地区？

就已有的资料而言，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中原地区社会矛盾相对平和。

中原地区最大的环境优势就是平原与平坦的盆地面积大于山地丘陵面积，河南这二种土地的面积就占全省总面积的 55.7%，而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山地丘陵则占全省面积的 80%。

一般而言，地势平坦的平原与盆地面积越大越多，不仅有利于史前农业的发展，而且人地关系也比较宽松，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和相处与发展。正因此，史前城址的数量与规模的发现就表明，中原地区一直就像“台风眼”风平浪静一样，是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不太激烈，且发生的时间较晚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地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发展状况则与中原完全不同。

长江中游，由于适合农耕平坦的土地较少，所以当地就成了中国史前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因此，那里不仅拥有中国时代最早的城址¹⁶、最早的内外城结构的双城城址¹⁷、最早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城址，还拥有长江黄河流域不同区域距今 4500 以前数量最多的粘土城址¹⁸。

黄河下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发现也说明那里的社会矛盾与激烈程度超过了中原。其中，距今 5000—4500 年期间，山东与安徽的黄淮之间就发现山东章丘焦家¹⁹、日照丹土²⁰、日照尧王城²¹、滕州西康留²²、安徽固镇垓下²³与南城孜²⁴等 6 座古城；距今 4500—4000 年期间，则一共发现城址 17 座²⁵。

北方长城地带，虽然石块垒筑城址较土筑更为简单易行，但大量的出现实际也是当地社会矛盾与激烈程度的表现。2006 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大规模调查，在陕西北部地区一次就发现了 20 余处史前石城遗址²⁶，年代多集中在距今 5000—4500 年。这些石城遗址一般都分布在山岭上，依自然地势而筑，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三、四十万平方米不等。

相对周边地区的城址，中原不仅出现的时代较晚，至少较长江中游晚了 500 年；而且数量也未超过周边地区。这说明，中原地区除了人地关系比较宽松以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相对较弱。

第二，最迟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整个豫西的文化面貌就比较统一，就流行庙底沟类型。这说明当地的人们早已有了相互交流的传统。

第三，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替时期，洛阳盆地就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²⁷；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在中原地区发现任何实力超过洛阳盆地古国的聚落组织。

仰韶文化时期，洛河北岸的 D 聚落群团拥有整个盆地发展状态最好的四项指标（图 5，1）。

1、遗址数量最多，20 个。

2、遗址总面积最大，326.9 万平方米。

3、有二个盆地内最大的遗址，面积分别是 66.5、56.2 万平方米（图 5，1，56、7）。

4、有一个盆地内最大的聚落群，4个遗址，整体 131 万平方米（图 5，1，56、55、52、43）。

然而，仰韶与龙山交替时期，洛河北岸的所有发展优势全部消失了，而洛河以南的所有聚落组织全部兴旺发达了（图 5，2）。

这说明，洛阳盆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盆地内出现了有人兴有人亡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说明中原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实力超群的，以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为特点的，各聚落组织之间拥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古国。

由于以前人们并不关心史前聚落的组织与组织形态的变化，而一味追求“区域聚落形态”中的大遗址大城址，视大遗址大城址为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象征，视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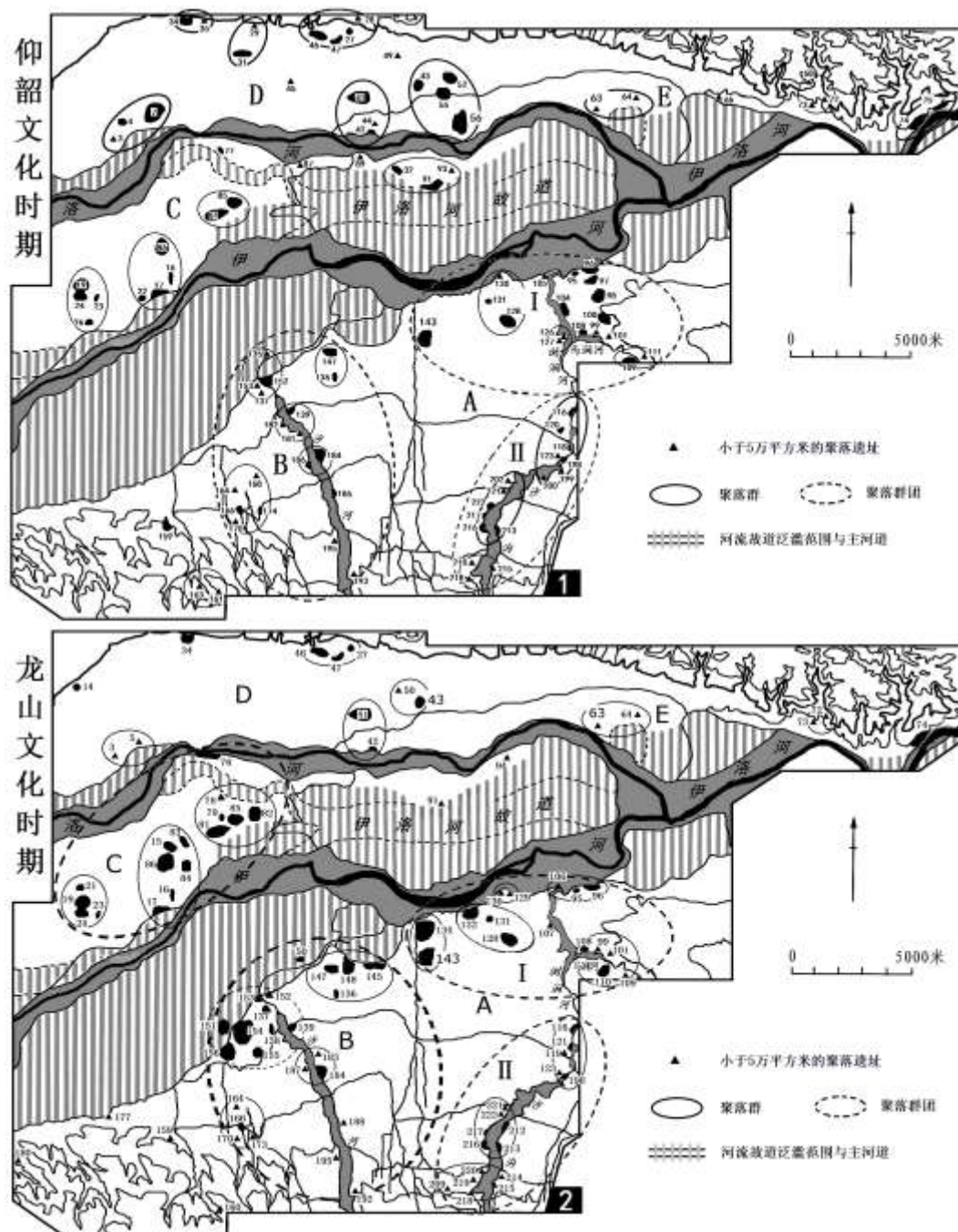


图 5：河南洛阳盆地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分布图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调查简报》）

石峁为黄河流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象征。所以，洛阳盆地的聚落形态特点与演变及其性质全部都被忽视并视而不见了。

实际上，盆地内洛河南北聚落与聚落组织的兴旺盛衰不仅是当地古国出现的标志，而且还为单一民族方国的出现准备了核心力量与社会基础，准备了史前的铁木真与努尔哈赤。

第四，豫西地区位于中原社会矛盾激烈冲突地域的外围和边缘。

与周边相比，中原地区总体上已经属于社会矛盾相对平和的地区；但是，就中原地区而言，豫西又是在这一地区内部社会矛盾与冲突最为平和的地区。

一方面，整个豫西从早到晚就没有一座史前的古城。

另一方面，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即整个夏朝时期，整个豫西地区也没有一座古城。

再一方面，根据史前古城的分布位置可知，当时中原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就位于现在河南淮河以北的京广线两侧（图6）。

然而，夏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条古城分布带的西侧，而商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条古城分布带的东北侧。

因此，以上现象说明社会矛盾冲突激烈的外围即社会矛盾相对平和的边缘地区更利于实体民族的统一与崛起。

第五，外族入侵的教训与启示。

距今5000—4500年期间，中原地区曾遭遇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图2）。

尽管当时各地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民族，但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却由东向西横扫了河南中北部，洛阳、平顶山、驻马店、漯河、周口、许昌、郑州、商丘，无一不留下了大汶口人的身影、文化遗物和墓葬。与此同时，与大汶口人打了就跑不

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仅也高举挺进了中原，还强行赶走了原住民，定居在了河南南部全境。河南南阳邓州八里岗遗址所见类似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前的遗存就表明，在“禹征三苗”之前，河南南部可能还有长江中游地区遗留下来的定居村落²⁸。

由于中原实体民族崛起的时间正好是发生在外族入侵之后，因此可以说外族的入侵实际也起到了一种强力的推动与催化剂作用，它使中原地区的人民意识到只有大规模的合纵连横才能将占领者赶走。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强悍的屈家岭人最后会从定居了几百年的河南南部全部退出？这实际就说明最迟于龙山文化时期豫西地区的实体民族就已在酝酿与形成之中。否则，它们就不会具有赶走屈家岭人，并进一步南下“征三苗”的实力。

第六，长江中游衰落了。

长江中游不仅史前城址发展先进，而且还拥有史前晚期工艺造型最复杂的玉礼器（图3），以及史前中国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与器物²⁹。此外，也是史前唯一一个有能力大举入侵中原并长期移民定居的自然民族群体³⁰。

然而，史前末期，长江中游的发展却走到了尽头。由于整体自然环境较差，社会矛盾过于激烈，各地血缘组织实力强悍长期水火不容，以致终究无法形成统一的实体民族。“三苗”的称呼实际就是当时当地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体化实体化民族的佐证。

总之，中原的兴起绝不是简单的历史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地缘化的实体民族，出现以这种民族为主体的早期方国，完全是各种复杂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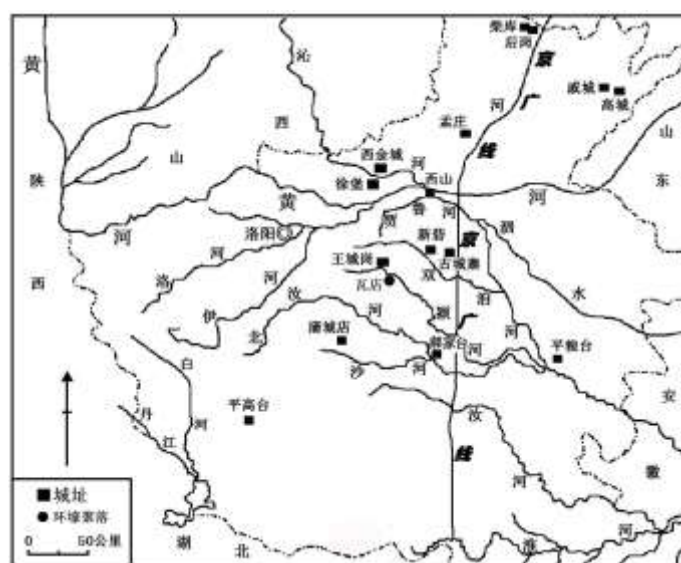


图6：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分布位置图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四、夏民族崛起的主要途径

夏民族崛起的途径涉及内外二个方面。

对内而言，主要关系到夏民族本身的形成，夏国主体的建立与维护等具体内容。其中有二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武力统一全境，扩大夏民族的占领范围与夏国的主体范围。

考古表明，史前晚期位于黄河南北两岸的文化区别很大。豫西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晋南是山西龙山文化或称陶寺文化。但是，夏时期二岸却都成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

对此，佟伟华先生《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³¹一文的研究就很有意义，并说明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最早就发源于河南的中西部，而二里头文化的向北扩展则实际经历了前后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夏人直接渡过黄河，并在沿岸的山西芮城盆地、垣曲盆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和殖民地。于是，当地就生出了根在河南中西部的原汁原味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图 7，III、VIII）。第二阶段，继续北上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并在降服当地土著以后，与之融为一体。于是，当地就派生出了地方特色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的晋南地方类型，即夏县东下冯类型（图 7，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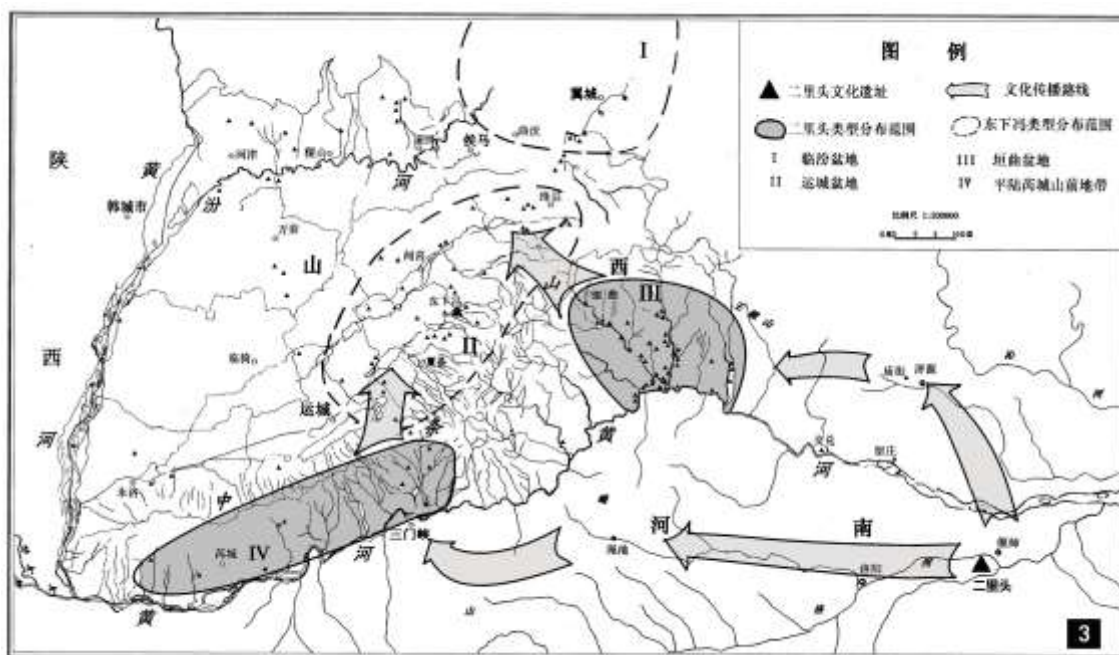


图 7：豫西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展态势图

（引自：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

显然，黄河北岸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与特点表明，夏民族所占有的黄河北岸的领地，夏国所拥有的黄河北岸的主体区域，主要都是以暴力和征服为基础而获得的。

第二，治水，发展生产，夯实基础。

大禹治水（《尚书·大禹谟》）十余年的历史传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治水的传说，而且还说明以往各自分散独立的血缘组织都不可能治理大范围流域性的水，只有势力范围广大的地缘化实力强劲的国家才可能为治理流域性的水提供社会与政治基础，才有能力治理具有流域性特点的水。

不过，夏禹治了哪里的水，治水的规模有多大，至今并不清楚。然而，这并不重要，因为水是农业的命脉，治水是地缘化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首要任务和必然选择。大禹之所以要治水，而且耗时十年有余，实际就表明当时夏国已将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当作了国家治理的头

等大事。

对外而言，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消灭或击溃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就是网罗追随者。文献与考古表明，在这方面夏有三大举措，

第一，“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

第二，禹征三苗（《墨子·非攻（下）》）。所谓“三苗”实际就是长江中游自然民族的统称。由于以往实力强劲的“三苗”曾北上入侵中原，所以二地结怨颇深，三苗也成了天下最大的“不顺者”，成了夏对外战争的重点和首选之地。

第三，“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之所以要会诸侯，一是炫耀实力，二是籍此网罗追随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以实力为基础，武功与文道同时并举，夏国延续了 470 余年，为中国历史牢牢地树立了第一个实体民族崛起的榜样。

五、夏民族崛起的历史意义

夏民族的崛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和实体民族国家的崛起。

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整个史前阶段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属于血缘组织。史前晚期距今 4500 年以后虽然出现了早期国家出现了古国，但他们都是以血缘组织为单位而建立的，具有明显的从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特点，因而可视为“血缘国家”（表 1）³²。

与早期国家、古国不同，早期方国即早期地方之国的组织模式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国家的组织主体不再是血缘组织，而是地缘一体化的实体民族，并由此导致国家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与社会的组织规模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都历史性的突破了血缘组织的界线。

夏民族的崛起就是这方面变化的最早代表。

第二，标志着开创了中国历史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史前晚期，由于各地人口的大量增加，聚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不断变化，不断由分散走向集中，走向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于是，随着社会组织模式的变化，组织的纽带也由血缘逐渐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地缘。其中，史前晚期的早期国家、古国，由于组建单位都是血缘组织，都是血缘国家，从而显示出最早脱离血缘社会的特点。与其相比，夏商周时期虽然也属于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但国家的组织单位已升级成为地缘化的实体民族，从而显示距离完全地缘化的社会与国家更近，并标志中国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不过，在国体即国家组织方式地缘化的外表下，国家政体即统治模式却依然还是血缘化的，西周“封建亲戚”即是明证。这说明夏商周时期所有单一民族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国体政体都同时地缘化的国家。

第三，标志中国历史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序幕已经揭开。

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就流行中原中心的历史观，但战国七雄的争霸实际就说明秦汉以前中原的中心地位还处在形成之中。

此外，历史还表明，促成中原成为中国政治中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一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崛起。

一般而言，地域的中心性只是一种自然因素，而纯自然的因素绝不可能使中原成为历史的政治中心，史前中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时期之后，自然地理中心之所有会逐渐成为历史中心，关键是因为那里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之所以会成为政治中心，则因为那里崛起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批以单一实体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实力超过了历史上

任何一个血缘组织。于是，在实力的支持下地理中心就转变成了政治中心。

正因此，夏民族与夏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序幕已经悄然揭开。

结束语

考古表明，混淆了“发展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区别，并以为地域临近文化交流频繁就会导致史前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出现实际与历史不符，也没有任何人类社会发展成果与产物的支撑。事实上，一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区域性的中心完全是实力和暴力的结果，至于地理位置的中心性和所谓先进的文化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和原因。

中原之所以从夏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段发展中心，关键就在于那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实力强劲的实体民族以及由实体民族组建的国家。于是，中原就成了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争霸中原逐鹿中原就成为了春秋战国各地诸侯的主要政治目标。

因此，作为中心，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不能借中原有一段是来证明史前中国已早有“多元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结构和影子。

（裴安平网址：www.peianping.com）

-
- ¹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 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 ³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 ⁴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 ⁵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 ⁶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 ⁷ 裴安平：《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分类研究》，《考古》2011年第4期；
龙文洪等：《华容七星墩遗址发现湖南规模最大新石器时代城址》，《湖南日报》2019年1月12日。
 - ⁸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 ⁹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 ¹⁰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 ¹¹ 王海明：《专家论证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1日；
张恒等：《“小黄山”万年古文明的见证》，嵊州新闻网2011年4月25日。
 - ¹²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张松林等：《新郑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大面积居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13日第5版。
 - ¹³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
 - ¹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版。
 - ¹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 ¹⁶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 ¹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版。
 - ¹⁸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 ¹⁹ 李佳霖：《济南章丘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中国文化报》2018年4月27日。
 - ²⁰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五莲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17日第1版。
 - ²¹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
- 30 期。
- ²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1 期。
- ²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固镇垓下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19 期。
- ²⁴ 单鹏博：《固镇发现第二座史前城址》，《安徽日报》2013 年 12 月 8 日第 2 版。
- ²⁵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 ²⁶ 冯国贵：《陕北发现 20 余处史前石城遗址》，《中国审计报》2016 年 3 月 20 日。
- ²⁷ 裴安平：《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三种文明起源模式研究》，《无限悠悠远古情》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 ²⁸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9 期。
- ²⁹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南方文物》2018 年第 3 期。
- ³⁰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 年第 2 期。
- ³¹ 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³²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